

## Robinson Crusoe 的?本研究 : 以牛山良助版和英爲 霖版?中心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s of Robinson Crusoe (J. D. Watson's Edition)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著者	李 云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volume	53
page range	A107-A120
year	2020-04-01
URL	<a href="http://doi.org/10.32286/00020447">http://doi.org/10.32286/00020447</a>

# *Robinson Crusoe* 的译本研究

— 以牛山良助版和英爲霖版为中心

李 云

##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s of *Robinson Crusoe* (J. D. Watson's Edition)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 Yu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by focusing on two versions of translations of *Robinson Crusoe* with illustrations by J. D. Watson (1832-1892). One was published in 1887 under the title, *Shinyaku Robinson hyōryūki* (新譯魯敏遜漂流記); the translator was Ushiyama Ryōsuke (牛山良助). John Dawson Watson's illustrations were also used in the later Chinese dialect version, which is under the title of *Gusulicheng* (辜蘇歷程).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a Cantonese version. It was translated by an English missionary with the Chinese name of Yingweilin (英爲霖版), and published in Guangzhou province in 1902.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both Japan and China experienced revolutions in writing. These translations were not only a part of those revolutions in each of those countries, but they also constituted a typ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especially Japan and China. By comparing the two works, we can see how they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cluding the translators' revisions to make the work more understandable to a Chinese or Japanese audience. In addition, the translators' purpose also made a big difference the two translated works. The study findings may serve as a basis for research on *Robinson Crusoe*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キーワード：文化交渉 (cultural interaction)、《新譯魯敏遜漂流記》(*Shinyaku Robinson hyōryūki*)、《辜蘇歷程》(*Gusulicheng*)、文化翻译 (cultural translation)

## 序言

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著作 *Robinson Crusoe* 就被翻译到了东亚地区。*Robinson Crusoe* 系列共有三部，分别为出版于1719年4月的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此为第一部；出版于同年8月的 *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为其续篇；第三部出版于1720年，题为 *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但是，近代被翻译到东亚地区的译本内容多为第一、二部，第三部几乎没有被翻译过来。第一部内容是以主人公在岛上求生为中心内容，前后则为主人公的商业活动，例如用小零碎换“黄金、象牙、黑人奴隶”的几内亚贸易从业者，以及经营巴西的甘蔗种植园，在意图走私黑人奴隶的航海行程中不幸遇到海难，流落到荒岛。第二部内容是以主人公返回荒岛，确认自己的殖民统治情况以及环游世界为主。第三部则是主人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陈列出来。在日本研究者岩尾龙太郎的观点来看：“这部小说包含着复杂的机能性。作者笛福在前人真实记录的荒岛手记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人们、或者说笛福自身对于新奇性的憧憬以及脱身·逃走的愿望、模拟·虚构的愿望来出色完成了这一小说。这一小说激起了各个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民众对主人公荒岛生活的向往，也不断地给读者们带来勇往直前的动力，又能让读者们自然地接受主人公必定要回归到有生产组织与支配制度的现实社会中。原作的这样一种吸收读者愿望并再投射的机能可谓是登峰造极之举。因此，对于读者而言，叛逃出正常社会所经历的困难，反倒是给在正常社会勤勤恳恳工作生活着的人们一剂安慰。使得读者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向讲述者的角色转变。”<sup>1)</sup> 这一论述，可以说从深层角度剖析出了第一、二部之所以吸引读者的魅力根源所在。因而，第三部以自省为主的随笔远远没有第一、二部流传得广也就理所应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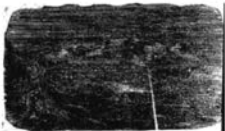





### 一 译文的底本问题

本文讨论的两个译本，分别是出版发行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的日本、由和田笃太郎出版发行、跡部素山校补、鹤堂牛山良助译编的《新譯魯敏遜漂流記》（下文记“牛山版”）和出版发行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中国、羊城真宝堂书局出版发行、英国教士英爲霖译的《辜蘇歷程》（下文记“英爲霖版”）。笔者将这两版译本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出于它们都译自于同一个英文版本，这样在对比译文内容的时候，就会更好地分析出译者以及译者生活的环境、成长的文化背景等等因素对于译文文本的影响。

笔者作出两个译本出自同一英文版的判断依据是从两个译本中出现的插图为线索推断出来

1) 参考：岩尾龍太郎，『ロビンソン変形譚小史物語の漂流』（みすず書房，2000年），第39-40页。

的。具体说来, 是通过将牛山版中出现的八幅插图与英爲霖版中的三十二副插图进行比较, 显然两个版本都共同使用了三张一模一样的插图(见图一)。分别是牛山版中的第3幅插图, 位于“第四回 孤衾怪夢骨更寒 回顧故山英京天”一章; 在英爲霖版中是第6幅插图, 位于第九章, 插图名为“豎木畫痕記念年月”。第二张共同出现在两个译版中的插图是牛山版中的第4幅, 位于“第五回 斷岸巖巖牆比朱門 飛禽走獸擬臣僚”一章; 在英爲霖版中是第22幅插图, 位于第三十章, 插图名为“遠見野人聚埋舉火”。最后一张共同出现的插图是牛山版中的第6幅, 位于“第八回 休言夢中莫正兆 現在得友泣拜天”一章; 在英爲霖版中是第28幅插图, 位于第三十六章, 插图名为“辜蘇拯救西班牙人”。虽然笔者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下载的牛山版插图不甚清晰, 但是细细看来, 无论从构图还是从人物的动作形态, 以及光影表达的笔法来看, 牛山版与英爲霖版应该都源自于同一版本。

牛山版	英爲霖版
 <p>第四回 孤衾怪夢骨更寒 回顧故山英京天</p>	<p>6</p>  <p>月年念記痕畫木豎</p>
 <p>第五回 斷岸巖巖牆比朱門 飛禽走獸擬臣僚</p>	<p>22</p>  <p>火舉埋聚人野見遠</p>
 <p>第八回 休言夢中莫正兆 現在得友泣拜天</p>	<p>28</p>  <p>人牙班西救拯蘇辜</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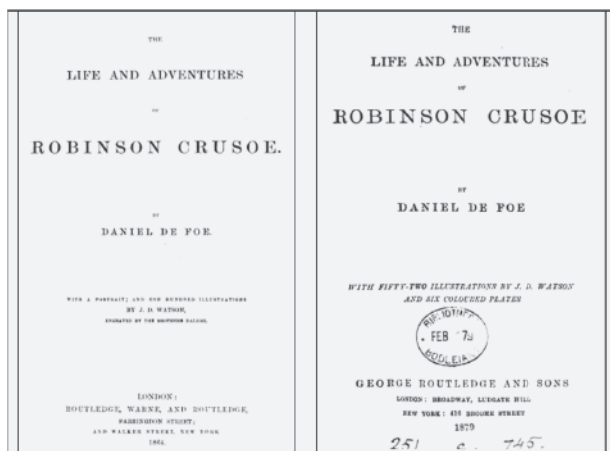
图一 牛山版与英爲霖版中出现的三幅相似插图

由此，笔者查阅大量资料，最终确定原插画是来自于约翰·道森·沃森（John Dawson Watson, 1832-1892）的作品。沃森是19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插画家之一。他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设计学院和皇家学院学校。他的作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期刊上，其中一些优秀作品也被刊登在了 *Good words* (1861-63) 和 *London Society* (1862-67) 上。沃森也给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创作插画，其中便有《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861），和《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864），而这些多是在与 Dalziel 两兄弟和 George Routledge 这样的出版商人合作下完成的。沃森是一位很有才华，并且很会赚佣金的一位画家。但是他本人又常常看轻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因为他太有才华，几乎没有在创作上遇到瓶颈与困难，这让他反而觉得自己在绘画上太轻松，进而到了自我鄙视的程度。但是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太轻松是缘于没有深度，但实际上他的作品精良、有严谨的构图与富于诗性的表达。<sup>2)</sup> 研究者 David Blewett 教授曾经评价沃森的画作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船、衣着、风景等的基础上，传达出了“感伤化”地“性格描写”。<sup>3)</sup>

而使用了沃森插图并且发表于牛山版或英爲霖版出版之前的版本，笔者共找到两版，分别是1864年版本和1879年版本（见图二）。首先根据牛山版中出现的8幅插图，可以排除1879年的版本，因为这8幅插图并没有全数出现在此版本中，反而是1864年的版本涵盖了此8幅插图。接下来判断的是英爲霖版中出现的32幅插图，同样地排除了1879年版本，而对应到了1864年版本。因此，笔者就目前所查找到的资料来看，牛山版和英爲霖版都是以1864年有沃森插图的英文版为原稿进行翻译的。

2) 参考：Simon Cooke (Ph.D., Assistant Editor for Book Illustration and Design), *Watson as an illustrator*, The Victorian Web, Visual Arts, Illustration, John Dawson Watson 栏目。http://www.victorianweb.org/art/illustration/watson/cooke.html

3) 参考：デイヴィッド・ブルーエット著，ダニエル・デフォー研究会訳、『ロビンソン・クルーソー』挿絵物語——近代西洋の二百年（1719-1920）——（関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第106-107頁。



图二 1864年沃森插图英文版（左）和1879年沃森插图英文版（右）

## 二 牛山版译者等的身份探究

牛山版的首页上标明“跡部素山校補”，译者署名为“鹤堂牛山良助”，书后版权页标明的发行人是“和田篤太郎”。从笔者调查的资料来看，鹤堂牛山良助的其他翻译作品还有春阳堂于明治19年、20年（1886、1887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梅蕾余薰：政治小説》，同社明治20年（1887年）出版发行的《双鸞春話》，同年，还有佐藤乙三郎出版发行的《西洋落語：英和对訳》，成文堂出版发行的《万国史直訳》；由其创作的作品有成文堂于明治20年（1887年）出版发行的《日本新世界》，同年还有由春阳堂出版发行的《日本之未来：社会小説》，成美堂出版发行的《松本氏会話（改正増補）》。明治21年（1888年），牛山为梅木正衛的译文《小文典独案内》做校，由富山堂出版发行。另外，据研究者今井卓爾的整理研究可知，鹤堂是将“良介”与“良助”两个名字分开使用的。在今井研究者的基础上，研究者浦和男将牛山鹤堂的生平进行了进一步整理。牛山鹤堂生于明治2年（1869年）长野县下諏访町；明治15年（1882年）到家附近的温故义塾读书，师从西师意，学习英语等；明治16年左右进京，没有进入学校学习，而是自学。三年之后就发表了前文提到的《政治小说 梅蕾余薰》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sup>4)</sup>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物，“跡部素山”，他的本名是正道，静冈县土族。据浦和男推测，素山应当是具备诗歌知识或是跟印刷所有关联的人。所谓的“校阅”不是对照英文来比较译文，而是“校阅”意译后的日语。<sup>5)</sup>那么，本文要讨论的牛山版译本，应当也属于此类之内。

4) 参考：浦和男，牛山鶴堂と『西洋落語』，国文学（101），2017年3月1日，第305页。

5) 参考：浦和男，牛山鶴堂と『西洋落語』，国文学（101），2017年3月1日，第316-317页。

### 三 英爲霖版译者身份探究

再来看本文涉及的英爲霖版，据笔者调查，此书共藏于三处，一处为东京大学，一处为澳门公共图书馆河东分馆，一处为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笔者将译者“英国教士英为霖”判断成英国牧师 William Bridie，便是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藏本作出的分析。

首先是笔者找到的第一个依据。在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这本书中，于第116号收录了《辜蘇歷程》一书的相关信息，并配有书中插图。在解说的部分，明确记录着：“Ms. Note on cover: The Revd. Dr [C.] Wenyon with W. Bridie's kind regards.”与此同时，在下文注释中，还写道：“Bridie joined the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in 1882。”<sup>6)</sup>

此处提到的 The Revd. Dr [C.] Wenyon，在冼宝干的《佛山忠义乡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的《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以及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中均有所提及，他的中文名字是云仁。

云仁 (Dr. Charles Wenyon) 1871年成为英国循道公会 (English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牧师之后，就开始牧养英国兰开夏的一个联区。随着传教经历的积累，云仁越来越感觉到医学传道的重要，于是他进入都柏林的皇后大学学习医学。由于他的勤奋和刻苦，1879年云仁牧师就考取了医生的资格。之后他又进入爱丁堡大学接受更多的医学训练。1880年，他在英国的利物浦遇到了刚从中国回去度假的英国循道公会来华的第一位牧师俾士牧师，受其邀请，云仁决定到佛山来开展医疗工作。1881年4月，云仁医生偕同太太和三个子女，一家人来到了佛山。经过简单的筹备，云仁就正式开始在佛山永兴街的福音堂展开行医工作，由俾士牧师充当翻译员。头一天就有一百多名病人前来求诊。随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云仁医生就差不多看了有六千个病人，其中有一百个病人进行了住院治疗。此外，云仁医生还完成了大约五十个手术。当时，病人经常因为数量太多而拥挤，以至于不得不施行预约登记，以避免病人等候时间过长。<sup>7)</sup>

为了彻底改善医院地方狭小的状况，1881年10月云仁医生在佛山鹰咀沙缸瓦栏一间大货仓内创办起“广济医局”。<sup>8)</sup>而广济医局便是现在中国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坐落在佛山市城南新区，占地715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3173平方米。东靠自然景区，

6) Hartmut Walravens,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第68页。

7)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3页。原文参考于：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Synod Minute, Report of Fatshan Circuit, 1881.

8)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3页。原文参考于：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七，1925年，第163页。



西临大福路，南通佛陈大道，北接季华路。环境优美，交通方便。

医院于1881年由英国人始建于缸瓦栏，后迁至太平坊，再迁文昌沙，1953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98年迁至现址，现今已有整整118年历史。现有在编职工1600多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14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5人。开放病床1200张，拥有大型贵重医疗设备694台（套）。设置65个业务和行政科室，并辖管肿瘤医院和垂虹门诊部，实行总院集团制管理。是佛山市最大型的综合性医院，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以及指导全市医疗工作的任务。1991年9月，被评为广东省首家三级甲等医院。<sup>9)</sup>

基督教英国卫理公会派人来佛山传教始于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最初建礼拜堂，继而开设诊所。1881年（清朝光绪七年）10月14日，惠师礼教会英籍传教士查尔斯·云仁（Charles Wenyon）来佛山，他既是牧师又是医生。云仁以广传医术，普济众生为宗旨，以宗教会名义在原火车站附近的鹰咀沙缸瓦栏一间大货仓内创办广济医局，这就是循道医院的前身。广济医局初期仅是门诊，只收药费不收谢（诊）金，医局的经费由教会拨给。<sup>10)</sup>

1883年（光绪九年）云仁医生被英国领事馆召回广州沙面，医院停业1个月。<sup>11)</sup>

1883年8月12日，广州海关卸货巡视员英国人罗根枪击中国码头工人，打死幼童。英领事虽将罗根扣留，但延不审讯。9月10日，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汉口”号值夜警察葡萄牙人笛亚兹将中国码头工人罗亚芬踢伤退落水中致死。“汉口”号轮船竟携凶手开船而去。一个月里外国人两次打死华人，民众愤怒愈甚，遂一拥而至沙面，烧毁英、美、德、法等国洋房14间。即所谓的“沙面事件”。清政府派兵弹压，逮捕20余人，还对外赔偿损失几十万元。广州人民既恨外人跋扈，又恨政府无能，甚至有揭帖咒骂两广总督张树声为“汉奸”、“走狗”。<sup>12)</sup>广州的骚乱很快波及到了佛山，打击、抢掠传教士和教友的事件不断发生。循道公会也有传教士被抢劫。<sup>13)</sup>为了安全，英国领事下令让当时在广东各地的传教士全部回到沙面去躲避，佛山的医院不得不关闭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倔强的云仁医生多次请求领事批准自己回佛山重新开业。<sup>14)</sup>领事无奈，只好特许他一个人回佛山，重新开始行医。<sup>15)</sup>云仁医生“中医生多有从而就学者，以故镇内西医，日渐推广，而尤以接

9)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12)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3页。原文参考于：邵循正主编，《中法战争》（5），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年，第10、19页。

13)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4页。原文参考于：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Correspondences, Dr. Wenyon to Rev. Jenkines, Fatshan, Feb. 11<sup>th</sup>, 1884.

14)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4页。原文参考于：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Correspondences, Dr. Wenyon to Rev. Jenkines, Canton, Oct. 13<sup>th</sup>, 1883.

15) 转引自：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4页。原文参



生保养为众所交推。中法向来轻视分娩，每多误于稳婆之手。自有西法而婴儿之夭折，产妇之厄难，比前较少”。<sup>16)</sup>

云仁任院长时期为1881年至1893年，晏惠霖任院长时期为1893年至1924年。<sup>17)</sup>

1890年（光绪十六年），因缸瓦栏房地不敷应用，乃由教会在太平坊（今上沙）购置两间较大的宗祠式平房，其中一间作教堂，一间作医院。此时，医局迁于太平坊，并改名为西医院。医院设有割症室（手术室）、诊症室和五间病房。云仁一边行医，一边传教。在这里行医的还有英籍医生马佐生和许诚恩等。1893年，云仁任院长长期满携家人返回英国度假。此时，外科博士晏惠霖接任院长。他来佛山主要是办教会医院，到任后在院内办了西医学堂，兼任校长。在他主持下，西医学堂先后办了10年，培养了100多名本地信教医生。在学生中以后成为名医的有：陈鹤寿、苏杰臣、林俊生、杜英甫、黎福庭、周逢寿等，使西医得以在佛山推广，尤其是西法接生开始为人们所接受。民国初，该学堂得到卫生部承认。<sup>18)</sup>

1890年，广济医局迁至太平坊，改名为“西医院”。1893年由晏惠霖牧师接任院长后，为把信徒培养成医生，又可解决西医生人手不足的困难，在医院内附设西医学堂，称惠师礼西医学堂。由外科博士晏惠霖任校长，英国医生任教。学制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采取边上课、边诊病、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教学。民国初年，该学堂得到卫生部的承认。西医学堂前后办了十年，培养了医生100多人，学生大部分是基督教徒。<sup>19)</sup>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随着西医业务的发展，原地难以扩展。晏惠霖提请教会批准，乃购买文昌沙尾高岗墩一带乱葬岗为新院址。新院兴建之前，先建一幢洋房，门上挂一块用中英文写的“英国惠师礼行”的招牌。英籍张辅德夫妇住在此，作为筹备基建办公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医院从太平坊迁来后，太平坊仍保留门诊一段时间，马佐生仍住在那里。新医院大门上挂一块“西医院”金字大招牌，人们称此为新西医院，区别于太平坊的旧西医院。由于门口是石砌圆形，所以又被群众叫做“圆门口医院”，亦叫“大西医”。<sup>20)</sup>

从中英两方的资料可证，云仁医生便是注释中所提到的“The Revd. Dr [C.] Wenyon”。而其后的“with W. Bridie’s kind regards.”则是在赠与他人礼物时会用到的一句话。同样的赠语也出现在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藏的版本中。这也是笔者找到的第二个证据。

在澳大利亚藏版的封面后面的扉页上，写有“J. H. Revd Esq. with translator Comfit (W

考于：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Archive, China, Correspondences, Dr. Wenyon to Rev. Jenkines, Fatshan, Feb. 11<sup>th</sup>, 1884.

16) 佛山市图书馆整理，《民国佛山忠义乡志》，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240页。

17) 参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18)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9)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2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Bridie) Hong Kong March 1903 Robinson Crusoe in a new docere”。此版本上的内容更可以确定, W. Bridie 就是此书的译者。

笔者找到的第三个证据如下。在 *Wesley's world parish: a sketch of the hundred years' work of 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一书中, 明确写道 “Whitehead and Selby have been invalided home; George Piercy has been compelled to retire, after thirty-two years of toil and struggle. Grainger Hargreaves (from 1878 onwards) figures on the Stations, Charles Bone (1880), William Bridie and Samuel G. Tope (1882)-each of whom has done notable work; and the beloved Roderick J. J. Macdonald is by Dr. Wenyon's side at Fatshan.”<sup>21)</sup> 在这里提及的事情, 刚好与佛山的教会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吻合, 因此, 可以判断译者英国教士英为霖便是 William Bridie, 工作于佛山教会医院的新教传教士, 基督教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

当时在佛山的另一位重要的医生就是麦路得医生, 他1859年生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 他的父亲曾是循道公会苏格兰年议会的主席。由于家庭的熏陶, 他从小就有浓烈的宗教感情。1881年, 麦路得在爱丁堡拿到医学硕士学位后, 又在188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 他正式投身循道公会差会服务, 愿意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传教。当时云仁医生正在佛山建立医院, 非常需要帮助, 于是, 麦路得医生受命前往佛山。临行前, 正式被任命为牧师。<sup>22)</sup>

1884年, 麦路得医生来到佛山, 在文昌沙云仁医生一家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 他和布兰德牧师 (Rev. W. Bridie) 一起学习中文、参观医院和道教堂礼拜。之后, 他开始单独和中国传道人道附近的村庄去旅行。<sup>23)</sup>

另外, 在麦路得医生1886年的日记中, “4月22日, 上午忙着看病人。下午和布兰德去了叠窖 (Tip Kua)。当他正在布道时, 村子里的长者粗鲁的上来, 命令我们离开。当人群散开后, 我们也只好撤离了。他们崇拜偶像。(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既大又富庶的村子一直很敌视, 虽然它离传教士的房子最近。1894年, 云仁家的房子重建。在这个村子里有留言说他的房子影响了荀子的风水, 要求他把房子的屋顶用柏油涂黑。云仁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村子里的人逐渐对他有了好感。1895年, 以前提到过的李家有个女儿嫁到了叠窖村。我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 这样进入叠窖的大门打开了, 以后再没有关闭。)”<sup>24)</sup>

21) Geogre G. Findlay, D. D. and Mary Grace Findlay, M. Sc. *Wesley's world parish: a sketch of the hundred years' work of 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Hodder and Stoughton Charles H. Kelly, 1913, 第156页。

22) 转引自: 张照, 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年, 第57页。原文参考于: Mrs. Roderick Macdonald, *Roderick Macdonald M. D.* London, Robert Culley, 1908, p.17-28.

23) 转引自: 张照, 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年, 第57页。原文参考于: Mrs. Roderick Macdonald, *Roderick Macdonald M. D.* London, Robert Culley, 1908, p.30.

24) 转引自: 张照, 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年, 第58页。原文参

上文中提到的布兰德牧师 (Rev. W. Bridie), 应该就是译者英国教士英为霖, 而且他们在中国学中文应该不晚于1884年, 虽然还没掌握他具体学习中文的情况, 但是下面一篇文章应该能从侧面证明他的广东话水平。

英为霖在1904年、即第35期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上发表了 *Cantonese Romanization*<sup>25)</sup> 一文, 在此文中, 英为霖将目前广东方言的罗马字注音系统的四个类别进行了分析。其中, 修改自 Sir William Jones 版的 Dr. Wells Williams 的广东方言字典 (*Cantonese Dictionary*), 已经被 Dr. Eitel 写的 *Cantonese Dictionary* 所取代, 但是其拼写仍大量沿用了原来的发音区别符号。另一个系统为 Dr. Chalmers 的英华字典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此系统的拼写继承于 Dr. Williams 的 *Tonic Dictionary*。最后一个系统是 Dr. Dyer Ball 所独有的, 见于他的广东方言课本。在这篇文章中, 英为霖同时提到, 用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的方式理解圣经, 这一行为在四十年前是不被看好的。而现如今, 在大多数传教士之间, 会反问自身在教堂用民众听不懂的语言读圣经是否是正确的? “非爲文乃爲神者, 蓋文至死神致生”<sup>26)</sup>。《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启蒙》(*A Primer for the study of Romanized Cantonese*) 已经两次再版。这是第一份用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的月刊, 于1902年发行于广东, 每月发行量是500份。正因为价格定的很低廉 (全年只要20分), 这份月报迅速受到欢迎。

同时, 英为霖在文章中提到文学仍不是很发达, 但也在成长。这其中包括由大英圣书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出版的《新约·四福音书》(*the Gospels*) 和《新约·使徒行传》(*the Acts*) 在内。而有一部分福音书已经再版多次。另外还有《赞美诗》(*the Psalms*) 和部分《旧约全书》(*the Old Testament*), 以及《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福音诗歌和短小的故事等等。以上书籍都是由北海的教会传教士协会承印。而所有的英国国教祈祷书, 都有手写的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

文章中同时还介绍了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的规则, 包括母音与辅音以及音节连接的规则, 和九个音调的注音位置等内容。在叙述相关部分时, 会用相应的简单例子加以说明。例如, 在介绍发音表记时, 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广东方言罗马字注音中的母音部分, 及其在英语中相类似的发音, 同时附有词例:

aa	and a final	as	a	in	father.
a	not final	as	a	in	fan. (后略) <sup>27)</sup>

考于: Mrs. Roderick Macdonald, *Roderick Macdonald M. D.* London, Robert Culley, 1908, p.34.

25) Rev. W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 第309-311页。

26) Rev. W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 第309页。

27) Rev. W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 第310页。

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前人的研究著书里被归为传教士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类别<sup>28)</sup>。

另外，笔者还在 archives 上查得 Bridie; William (1855-1911) 的相关资料显示，他于1888年3月9日与 Gertrude Williams 结为夫妇。他的妻子曾在武昌教区为女性教育事业服务了3年，二人成婚后，她仍服务于女子寄宿学校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并且得到她丈夫的帮助。<sup>29)</sup>

目前，从笔者找到的资料来看，可以判断出《辜苏历程》一书的译者英国教士英为霖，便是 William Bridie，1882年年来华，至1905年工作于佛山教会医院的新传教士，基督教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同时掌握广东方言，并且认为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教是可取的一种举措。

至于“羊城真宝堂”的出版社相关资料，笔者尚未获得具体信息。在此，只能引用前辈研究者宋莉华的研究结论：“羊城”为广州别称。“真宝堂”又作“小书会真宝堂”或“羊城小书会真宝堂”，位于当时的广州租借沙面内，为教会书局，曾出版过德国礼贤会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所著的《德国学校论略》(1873)、《自西徂东》(1884)、《教化议》(1875)、以及云仁氏著《圣教要义》(1894) 等书籍。<sup>30)</sup>

#### 四 英雄梦

牛山版翻译了原著的第一、二部，而英为霖版则只翻译了其中的第一部。众所周知，原著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主人公鲁滨孙 (Robinson Crusoe) 离开岛屿之前的生活，在那里他从零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英为霖版只翻译了一部分而没有翻译其他部分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鲁滨孙的故事并不如在日本流传地广泛。在此牛山版之前，日本还有其他七个版本的鲁滨孙故事的翻译版本。从明治时代 (1868-1911年) 开始，日本每五六年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问世。而在中国，除了英为霖版，1902年也只出版了一个版本。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他们不懂任何外语，那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接触鲁滨孙的故事。如何让普通的民众对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外界故事感兴趣？如果当地文化还不能接受外国思想，那么译者的处理方式，很可能直接影响到译文在新的文化土壤上存活的状态。以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对原文进行灵活的文化翻译，不妨是一个行之有效地方法。

接下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牛山版的鲁滨孙有哪些特别之处呢？首先，在牛山版中的开头部分，可以说译者就已经开始发挥他的权力了。开篇伊始，主人公首次经历航海出游的情节上，译者便不遗余力地刻画出了一个英勇顽强的主人公形象。具体说来，原文中的鲁滨孙在第一次航海

28) 参见：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29) <http://archives.soas.ac.uk/CalmView/Record.aspx?src=CalmView.Catalog&id=MMS%2f17%2f02%2f09%2f06>

30) 宋莉华，《辜苏历程》：《鲁滨孙漂流记》的早起粤语译本研究，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64页。

时，当遇到恶劣天气导致的行船不稳，他是相当害怕的，以至于都跌倒了。但是在牛山版中，译者将软蛋主人公的柔弱一面完全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迎难而上、血气方刚的青年楷模形象。即便这是他第一次出海，也很快就习惯了恶劣的天气，以及船上的糟糕状况。

而在下一次航海的行程中，深得船长喜爱的主人公，凭借勇敢、聪明等等一些列优秀的品质，在船长不幸因病逝世后，马上担任起了代理船长的重要职责。但是原文并没有这个情节出现，牛山在做这段翻译时，做出了三处的改写。第一处改写，是将原文中的两次航行合为一次航行。第二处改写为船长病故的时间点，原文为第一次航行回来后船长病故，改写后这一事件被安排在了航海途中。第三处改写，是代理船长的人选问题，原文是由之前的大副担任，改写后则是主人公成为了新任船长。这样的改写，就直接将主人公临危受命、不卑不亢的英雄气质烘托了出来。

又比如还是在这一次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代理船长后，不幸遇到了索马里海盗，在逃脱无望后，他便立刻决定与他们正面火拼、决一死战，却不料敌人已经偷偷潜入了己方船舶内，最后不幸被俘。原文这里描写的惨状要更甚一些，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刻画描写。因此，牛山版译文在用力刻画英雄式人物主人公时，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在处处烘托。

如果说这就是尽头的话，那还是太早了，原著中的每一个情节，都被牛山版用来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了。如主人公到了荒岛上，也是处处都展现了他的勇猛、果敢、进取的方方面面优秀的品质，征服了礼拜五，也征服了流落荒岛的欧洲人，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与地位。

那么为什么牛山版的主人公会被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整个牛山版通读下来读者们一定会相信鲁滨孙是一个勇敢，聪明，值得信赖的少年。当时在日本，政府认识到青少年教育非常重要。他们鼓励青少年大胆，包括出国探险和体验。

## 五 商人魂

英爲霖版则从故事一开始，就让读者感受到了商人生活方式的氛围。比如一开篇就表明主人公的父亲常年是做生意的，有好大家业；母亲家在当地也是殷实人家。他们努力工作、并开展公平的业务。他们给家人提供好房子供居住，给家人品尝美味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以及积极对子女进行技能教育投资。译文是用广东话写的，从语法到发音，一切都与普通话不同。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中文版的读者应该来自广东地区。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商人的生活气氛如此明显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广东的文化、尤其是佛山文化在译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这里特别提到佛山，是因为在前文的第三小节、英爲霖版译者身份探究中，笔者判断出了译者1882年来华最初就在佛山任职，于1889年移居广州。可以说在译文文本形成的过程中，译者就主要居住在了广东佛山这一地区，他是一位受命的教育传教士，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武昌区卫斯理卫理公会妇女协会从事教育工作三年。1892年，这对夫妇休假到英国，但在1893年夏天，译



者开始负责广州的神学院，又回到了中国。除了1888-1889年前往英国休假外，他与妻子一直在广州，还协助建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他的妻子协助妇女接受教育并监督圣经学习直到1905年回到英格兰。1903年，他移居香港，在那里他担任军方和海军牧师的职务，扩大会众。但是，到1905年，他回到了英格兰，被派往兰开夏郡的帕迪汉姆。1906年，他被要求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营地担任牧师，直到1911年10月9日因事故不幸去世。

这样看来，译者在中国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广东佛山一带，那么，这里居住的人们都有什么样的文化特色呢？佛山属于广东，处于岭南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地区。广东是岭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的主体精神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岭南文化在中华全国文化中是属于地方性的区域文化，而岭南文化所以形成地方特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与中原内陆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从地域上看，广东靠山面海，在山与海之间，有着交错的山地、丘陵和平原，在原始时代，是一个宜猎宜耕的地区，内陆农业文化在这里发生发展。广东大陆部分由长达4314公里的海岸线，还有众多的岛屿，海岸线曲折，岬角交错，大小沙丘连绵不断，先民在这里向文化的发生、交融，为以后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也使这一文化具有自己强烈的特点。对于岭南地区的疆域地里做历史沿革的考察，总体上和社会经济的裱花，民族迁徙和人文习俗的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开发，使南海郡治番禺，在汉代已经成为国内有数的商业城市。而到了宋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垦辟加快了，同时重视水利建设。明代中叶以后，已经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推动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繁荣。岭南手工业，如佛山的冶铁业，石湾的陶瓷业，还有甘蔗产区的榨糖业等，已出现工场主与雇佣劳动者不同身份的人。而岭南文化的发展，基本上随着地方经济的开发和交流，政治上与中原地区的融合，从而在文化上也逐步得到提高。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岭南与中原地区比较是相对落后的，但却保存着自身的文化特色。<sup>31)</sup>

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邻港澳的佛山也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性格。研究者罗长斌在《从佛山早期天主教看佛山人的价值观》<sup>32)</sup>一文中指出，虽然佛山涌现出来的武术大师，如霍元甲、黄飞鸿、梁赞、叶问很是耀眼，但是在文化教育上却是业绩平平，尤其是错过了近在咫尺的天主教，因为当利玛窦在肇庆传教之时，热衷于商业的佛山开始兴起了武术热。而在《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中关于佛山信教徒的资料只有只言片语，可见佛山的信教徒数量的稀少。同时，罗长斌也分析到信徒少的原因之一便是佛山人民热衷于经商、习武，对信教不太感兴趣。但是，佛山人的商业文化和习武文化造就出了有钱之后的知足满足的、

31) 参考：张磊等，《岭南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32) 罗长斌，《从佛山早期天主教看佛山人的价值观》，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3年12月），第134-139页。

较温和的、较慎重的、不滥用武力的心态。

那么我们回到英爲霖版中，既然读者群对于信教不太感兴趣，对商业热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爲霖版的译文中，特别是开篇伊始营造出的商业氛围了。对于佛山人来讲，英爲霖版的故事仿佛就是居住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邻居，会拉近译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样在译文被民众接受上，就会更加容易一些。那这样一来，考虑到译者的牧师身份，与其妻子从事的工作，就不难推断出译文所承担的传教责任了。通过当地人能够接受、且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达到传播知识、起到宣传的教义的作用。在译本中，原著中关于教义争议的讨论部分都被全数删减掉了，剩下的教义更加地浅显易懂，并且很容易获得救助，得到身心上的安慰。

## 小结

本文通过着眼于《鲁滨孙漂流记》的两版与沃森插画相关的译本，来试图阐明东亚的文化互动的一隅。在近代东亚，日本和中国都经历了写作革命。而处于这样浪潮中出现的翻译文本，也都参与了其中，而且在文化碰撞下产生的译文，时代印记要更强一些。通过对比译文，调查译者情况，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发生变化的原因。这些翻译译文同时也构筑了欧洲与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种文化互动。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都是结合了当时的各自目的，在制作译文文本时迎合了各自的需要。当然，本文中讨论的问题仅仅是两部译本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今后还会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1. 岩尾龍太郎，『ロビンソン変形譚小史物語の漂流』，みすず書房，2000年。
2. 浦和男，牛山鶴堂と『西洋落語』，国文学（101），2017年3月1日。
3. デイヴィッド・ブルーエット著，ダニエル・デフォー研究会訳，『ロビンソン・クルーソー』挿絵物語——近代西洋の二百年（1719-1920）——，関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
4.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编，《百载医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罗长斌，《从佛山早期天主教看佛山人的价值观》，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3年12月。
6. 宋莉华，《辜苏历程》：《鲁滨孙漂流记》的早起粤语译本研究，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7.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张磊等，《岭南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9. 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 Hartmut Walravens,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Rev. W.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
11. Geogre G. Findlay, D. D. and Mary Grace Findlay, M. Sc. *Wesley's world parish: a sketch of the hundred years' work of 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Hodder and Stoughton Charles H. Kelly, 1913。
12. Rev. W.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